

如今高考比当年高考要整整推迟了一个月，当年的高考天气，大多是在盛夏小暑前后，那种挥汗如雨，那种天干热燥，那种令人窒息的闷热，非亲身经历者，很难体察。

进入六月，考生大都会陷入焦灼、忐忑状态，失眠，神经衰弱，六神无主，绝望，情绪波动。对我而言，则是上火牙痛，鼻炎发作，那种处于崩溃临界点的煎熬，难以言表。班主任陈景皓老师，个高，脸黑，走路稳健，步子很轻，他凌厉强势，讲课精准利索，视学生如子侄。此时的他一改往日的威严、不苟言笑，温煦，蔼然，大致是为了安抚自己学生们的情绪，从不抽烟的他，居然也香烟在身，呈笃定安闲状，有大战在即羽扇纶巾的意思在。当时没有985、211的说法，却有重点、本科、大专之论，言辞谆谆，举一反三，有时候觉得信心满满，唾手可得；有时候，又觉得遥不可及，缥缈无望。全县预考，类似如今的模拟考试？结果还算差强人意。

谁能想到，此一考试刚过，我就病倒了，高烧不止，吃药无效，挂水也效果不大。学校距离县城医院还有一段距离，就医排队，也并不大方便。爹娘带着去城西的县医院，还有城内有一家唤作“二门诊”的小医院，给我看病的是一位姓温的医生，据说还是很权威的大夫呢。他也是束手无策，毫无办法。妈妈借一架子车拉着我，大致在三里桥还是小鱼塘，爹娘遇到熟人，与之交谈。我盖着被子，蒙头昏睡，头昏脑胀，隐隐约约听到父亲与人说话者，应该就是陈景皓老师和刘素英老师夫妇，他们也都是我父亲的老师。陈老师劝我爹娘说，本来可以考上本科的，这样一场病下来，估计只能是

1978年的高考是在盛夏七月进行的。考后等待的忐忑不安与炎热的天气交织，情绪的焦灼可想而知。

首先等的是分数。这年是知分填报志愿学校志愿，也就给了你半个来月的估分时间。对着几门课的标准答案，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不知盘算了多少遍，一天的情绪要轮转好几个版本：希望、绝望、兴奋、沮丧……我得要考上啊，都二十二岁了，在这个本该大学毕业且法定可以成家的年龄，还在痴痴地做着大学梦！

考的是文科，最耽心的还是数学拽后腿。一个只能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人，不交白卷就很不错了！母亲时不时地隔着门缝看我，端来一碗清热败火的绿豆汤，安慰几句：反正有工作（公办教师），考不上就继续上班拿工资呗。

说归说，我还是看出了她眼里的期盼。

分数揭晓了，比自估的高出近五十分！数学居然得了四十几分，这要归功

## 那年高考在小暑

王振羽



盛夏 肖明 摄

大专了啊。刘老师喊着我父亲的名字说，孩子已经很努力了，也不要再给他太大压力了。爹娘叹着气说，是的，是的。

终于止烧了，脑子清醒了。但，距离高考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我的考场是在学校被称作“过屋”的一间大教室里，划有警戒线，用的白石灰，无不恐怖之感。监考者来自鲁山，神情肃然，如凶神恶煞一般。两天半的考试，答题纸所用铅笔，都有严格要求，每场考试，也都发演算纸两张。大家排队入场，检查笔具，我的铅笔头居然断了。一阵紧张，身后一后来读了清华研究生的同学连忙把她备用的铅笔递给我，真是雪中送炭，太过及时。

我当时心生疑惑，考数学需要演算，其他科目也需要演算纸吗？监考者要求，演算纸上必须写上考生名字，这一要求从何而来，不得而知。有意思的是，面对考卷，所谓闷热焦躁，所谓窗外树上知了的疲惫刺耳的嘶哑尖叫，统统遁形，只有面对题目的紧张前行，心难旁骛，一一破解。一场接着一场，最后一场考试出来，如释重负，也怅然若失。金领哥家的嫂子对我说，你一进考场，咱婶就在家跪着祷告呢。闻听此言，多日的压抑紧张神经紧绷，顷刻释放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嚎啕难禁。

考试过后，开始估分，填报志愿，不是如今的出来分数后再选择

高校。估分也是一种有些难度的技术活，要回忆复盘，与标准答案比对。最难拿捏的就是作文，给分多少，充满不确定性与偶然性，而作文的分值又比较高。父亲多次参加高考阅卷，也深知其中的捉摸不定难以把握。估分过后，选择院校。人在中原闭塞小县，又无如今的网络资讯发达，哪家大学适合自己，怎能知道？近一亿的人口大省，高校资源之贫乏，考生竞争之激烈，人尽皆知，夫复何言？

估分结束填过高考志愿，高中生活就算结束了。同学们各有心事，彼此星散，来不及道别，大概也不大懂得告别，同窗共读，就此别过，大多数同学也就再无见面重逢之日了。一切似乎暂时尘埃落定，回到汝水边上的小小荒村，陪爹娘拔除玉米地里的杂草，还有施加化肥，乡人们称作“点化肥”，是一名字叫大南路的耕地里，玉米高大壮阔，密密匝匝，被诗人艾青称作“青纱帐”。置身如此的青纱帐里，恕我直言，真是毫无诗意可言，汗流浹背，喘气艰难，化肥的气味呛鼻，玉米叶子摩擦手臂，血汗交织，斑痕粼粼，此种滋味，真不好受。还要去掰烟杈，也是苦不堪言的一种遭罪农活，烟叶烟棵与人亲密接触，浑身油腻汗腻，奇痒烦躁，烟田辽阔，漫无际涯，让人抓耳挠腮，手足无措。

农活告一段落，吃罢晚饭，到汝水里泡一下，真是难得的凉爽。夏夜多少有点凉风，漫步去草门楼与一发小聊天，说校园种种，说考试细节，无话不谈，直至天亮方止。她送我走在狭长的胡同里，到了巷子尽头，彼此告别，她轻轻地说，三姑娘也要订婚嫁人了呢，婆家就在邻村王湾。

看得出，我的情绪传染给了母亲。中午饭后洗碗，她拿着碗，愣愣地站着，任凭自来水哗哗地流。下午三点多钟，就不打招呼出门了。

傍晚，我站在家门口发呆。只见母亲拿着一个大信封，高高举起，一路小跑过来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通知来了，通知来了！夕阳给她全身镀了一层金色，晚霞酡红，天边一片璀璨。

我慌不择路地迎上去，从她手里接过大大信封，黄色的信封右下角几个鲜红的字：上海师范大学。

我激动得双手颤抖，母亲眼里噙满了泪水。

母亲告诉我，录取通知书是她从邮局直接取来的。那里不熟悉，七弯八拐地找到一个熟人，进到分拣处，在一大堆邮件里寻到了它。拿走也费了一番周折，那时没有身份证，又不是本人来取，这么重要的挂号信都要专人送达的，岂能轻易给你。母亲和熟人一再保证，好话说了一大堆，总算遂愿了。

第二天，她就请假给我收拾行李，尽管离开学报到还有半个月。母亲塞给我几十块钱，让我去买了一件藏青色涤卡中山装和猪皮皮鞋，为的是让我在上海的亲戚们面前有“台型”（上海话，面子）。她还到银行把我工作几年攒下的三百六十块存了个四年定期，说是毕业后办大事用。

那信封至今还保存着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却装满了回忆与思念。

## 母亲取来通知书

许若齐

当数学老师的同事。她告诉只要知道的都写上去，解题的步骤也给分的。成绩排当地文科第二，据说在徽州地区也是名列前茅的。我们学校包了前三甲，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应届生，曾是我的学生。我的心一下大了：进重点大学是笃定的了，问题是选哪个城市哪个学校。

一纸官方文件言之凿凿：为稳定教师队伍，凡中小学公办教师，一律只允许报考师范院校。我多少有点悻悻，继而无奈，看来只能在华东师大（当时叫上海师大）与北京师大中选择了。心仪的学校可是复旦啊！

母亲当然是希望我去上海。那是她的故乡，我的外婆、几个姨妈都在那里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母亲从繁华的上海来到徽州，多少年在乡村卫生所做助产士——一个迎接新生命的职业。我曾到过她工作过的大山里，那是皖赣两省交界的地方，新安江的源头，群峰叠嶂，水重路迢，要步行数十里，翻山越岭进去。没有自来水、电、电话，当年对着如豆的油灯，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度过无数个风吹松涛的夜晚。她会想到自己的童年与少女时代么？南京

路的霓虹灯、静安寺里的菩萨，冬天吃老大昌的松子糖，夏天喝正广和的汽水，母亲和姨妈们背着书包，手拉手地上学……

我去上海读书，等于回家啊！老人家的，又多了一份牵挂。这牵挂，无疑是快乐的，幸福的。

于是，我在第一志愿上填满了华东师大文科的所有专业。

接下来就是难捱的等待时光。九月初，秋风乍起，一份份录取通知书也飘然而至。让我有点郁闷的是，分数低我十来分的一位老兄，居然进了北大。我们前三甲报的学校恰好是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三个直辖市。第一天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通知书，录取者多年后成了国内著名法学家，一度在央视出镜率相当高；第二天来了天津南开的通知书，录取者毕业后供职中科大，亦是知名学者；学校的同事们料定第三天会来上海的，嚷着要让我请客。

第三天落空，第四天同样落空。我变得有些惶惶，茶饭不思，心神不定。第五天，前夜睡不着，一大早就像无头苍蝇，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。

